

扫描卑微生命的英雄光谱

——广播小说剧《侠盗》编导札记

赵卫明

摘要：作为类型特征十分明显的“抗战剧”，如何在新时期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能量？本文作者以一名编导的身份，以及所编创的一部作品探索为案例，着重围绕平民英雄的形象重塑和人性光辉的发掘，从小人物的庸常与平常中追求哲思的超常，在贯通了的民族血脉里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叙事立场，涵养不竭的创新元气。

关键词：平民英雄 形象塑造 叙事立场

一种曾被认为中国特有的文艺类型，“抗战剧”在经历一段时间花团锦簇般的繁华后，在迎来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时遭遇冷寂，令人扼腕，发人深思。无独有偶，同样是战争片，二战剧也遭逢过同样的冷热。然而，作为类型鲜明的文艺样式，它至今仍是世界影视剧中的一个主流存在，时不时会有热点甚或经典作品，去冲击新一代观众的眼球。

当角力的斗勇、智力的交锋和阵营的对决已成叙事过去式的时候，当下的人们更关注人类所共同珍视的一些价值与品质，诸如苍生民瘼、担当勇气、化解苦难、一诺千金等等。它们超越昔有的宏大主题，却深深地楔入人情世故，即使是人性泛出的微光，也足以让人感怀，温暖着今天置身时空这一边的我们。

有鉴于此，连续广播小说剧《侠盗》在献礼这个胜利纪念年份的同时，在创作理念和品质追求上，更着意关注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命体验，于宏观背景下追寻卑微生命发出的光亮，让其穿透幽深的时空隧道，表现出“声音大剧”的应有品质。

一、烽火任侠绘群英

今天的我们，就像怀疑纯粹的爱情是否在世一样，也一直为“义”的存在不断修正着定

义。这部剧之所以冠以《侠盗》，源于主人公以盗的外表示人，骨子里却透着浓浓的侠义精神。另一方面，也为任侠的新解，用文艺赋予它新的蕴含。

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侠义文化熏陶传统的古国。风气所至，国人对这一文艺形象和类型具有极强的审美体验和辨识能力。《侠盗》的故事情节中规中矩，是一个人们熟稔的侠义传奇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，美国空军报复轰炸东京，中国沿海机场因城门着火殃及池鱼，一组因缘际会，引发抗战期间一场规模空前的浙赣会战。一场牵动三国神经的大战，可谓战争的宏大叙事。《侠盗》对于对垒阵营的运筹，有所涉猎，惜墨如金，仅仅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，却留出更为充裕的空白和浓重的笔墨，去描绘一群汲汲于底层形同蝼蚁的中国草民。他们以各自的奋起方式，一步步走向战争，成就了一次英雄的传奇。

声名不佳、视若鼠辈的偷鸡贼周富浪，虽然一次次有洗白灵魂的自我救赎冲动，却因为好强要胜的江湖性格使然，最后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被战争裹挟，智炸日寇重兵把守的铁路钢桥，使得输送鬼子战争给养的浙赣线顿时瘫痪。在桥断楼塌的废墟上，一个盗贼终于完成了任侠与英雄的人格屹立。

战争之下，谁都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因此，《侠盗》扫描的是战火烈焰炙烤下的生命色谱。除了工笔重彩描绘草莽英雄周富浪的同时，点染皴擦间，寥寥数笔，将孙五歪等一批鸡鸣狗盗之徒的人性光亮跃然于眼前。重塑侠义的形象，作品也不忘对于同一战壕不同派别战友的关照。在民族大义感召下，忠救军破袭队暂时放弃了摩擦与羁绊，同仇敌忾，不计生死，也表现过曾有的血性和壮烈，留下了历史人文

景观里尚存余温的一笔，实属少见。

同样，这种侠义的赋予，还给予了支援抗战来华美军爆破战家赫尔。对于侠义这个身气群体，它的身份确认一直仅限本土族类。赫尔的形象虽然只是一笔带过，作品显然也把他归入了任侠的谱系，也算创举。因为有了熔炉，顽铁炼成精钢。浙赣会战就是这样一座煅烧灵魂的大熔炉，战乱反而使得微尘成山，豪侠群出。

在传统的审美中，任侠多身怀绝技，蛰伏民间，独来独往，或隐姓埋名，或长啸狂歌于市井酒肆，惊世骇俗，无视家法国法，特立独行，视权力财富如粪土。而今，我们用形象定义侠义：他们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爱国爱民，机智勇敢；扶贫济困，惩恶扬善；为人仗义，肯于助人；路见不平，替天行道。大义、诚信、血性、牺牲，至今仍然是壮实我们这个民族骨骼必不可少的精神钙质。

二、罅隙之间演精彩

一部《侠盗》广播小说剧时幅百分钟，表现空间亦不过浙中古镇一隅，如今置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视阈之下，所展示的也不过是一条战争的罅隙。从历史、传说、小说，再到搬演为剧，我们的工作就是从文本出发，借助自己对那个特定时代、特定人物的理解和灵魂的洞悉，去创造、再现和复活，填补叙事空间的罅隙。

固然，我们对那场战争不同营垒的将帅及传统英雄，早已耳熟能详。不过，战争不是一部只有主角的大戏，它还有许多配角和小人物，一般屏蔽或被埋于叙事的夹缝中，鲜为人知。并且，草民往往是战争的最大牺牲者和投入者，没有他们的亮相和露脸，于情于理，都无法说是公允。现在，我们的责任就是采用声音艺术的手段，让这些形同草芥的平民，走向前台，哪怕是露个脸、说几句台词，也要绽放出如同传统主角般绚烂的光彩。

事实上，作为该剧的创作使命，就是要让这批平民蹦跳着鲜明别具的个性神采，走向前台，那些自视紧扼住战争喉口的统帅贵胄，反而成了平民英雄的反衬和“跑龙套”的小角色。的确，在剧情所发生的罅隙里，这些卑微的配

角为了生存、抗争和理想挣扎着，也不可避免地与同类、与环境、与价值、与敌人，甚至与自己内心世界，发生着强烈的冲突。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断言：“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。”正因为冲突无处不在，剧中的小人物们个性愈发鲜明，审美情趣横溢。

在道德边缘地带生存的周富浪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。因偷鸡摸狗，他自惭形秽，又自负自大，冲突于内心深处的是为人与生存的较劲，痛苦中以坚守所谓“盗亦有道”的底线自欺。又因一场为名誉和地位的守护而被迫卷入战争旋涡，意外地获得人格汰洗和精神重塑，他也获得了生命和灵魂的双重重生。此时，一个平民战士诞生了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那场为正义搏杀的战争中去，也实现了一段英雄的梦想。

与周富浪为同门同道的孙五歪，也是一个手段了得的偷鸡贼。也许同行是冤家，狭路相逢，与周富浪明争暗斗，又利用对方虚荣自负的脾性弱点，挖坑设局让对手自跳。想不到，差点要了人家性命，这才幡然醒悟，沉睡的天良与江湖侠义也同时苏醒来。集刁、妒、悔、恨、义于一体的孙五歪，因与人与己的冲突摔打，渐渐脱掉人性中的顽劣，草莽也在锻炼下成长为党所领导的“小三八”游击队战士。

战争更没有让女性走开。纯朴、善良、明理、果敢、刚烈的姑娘菊红，敢作敢为不避指摘为公道挺身而出，与周富浪冲突时起。当最后得知对方不惜牺牲勇炸钢桥时，女性的柔情如山泉破岩而出，置身于生离死别的煎熬中百感交集，并将这种复杂的情感盛放于送行时的一壶酒、一钵汤里，柔肠寸断，催人泪下。

强化冲突，营造反差，作品该为物架构性格曲折离奇的成长空间。除了人物与人物、人物与社会、人物与自然的冲突，反差之美也俯拾皆是。翻译官佟二头自私的躯体内，灵魂拷问，煎熬挣扎，不时为同胞掩遮，其形象超越了从前对汉奸类型的简单复制，具有典型意味。日寇守桥队长松根斯文色厉的外表，包裹不住内心嗜血变态的丑恶，然而对于血性与刚烈又暗生敬钦，几乎不可理喻。即使是对蒋介石、戴笠及敌酋的形象塑造，笔触轻点，冲突与反差深入灵魂深处的节点间，栩栩如生。

三、烟火声气养生机

作为一个小众艺术，广播小说剧应该在精神和情怀上有大追求，尤其像《侠盗》这样的题材，应警惕当下沉湎世俗、轻慢崇高的时风隐忧，而落入轻浮、猎奇、刺激、重口味的低俗窠臼；从凡人小事中，体现人物的高洁；在平民生活的世俗中，开掘出他们对美好、尊严和生命的向往，提供给受众一个可感可赏可叹的厚重“历史感”，也就是审美的生态空间。

世俗之中有烟火，平民不乏豪杰出。也正是这蓬勃的烟火滋养过平民，使得卑微的生命扛得起时代的大担当，作品也就有了一个哺育形象、供养精神、可以审美的立体多维的生态空间。

就环境而言，《侠盗》应是抗战背景下的一幅烟熏火燎的风俗画卷。剧中的典型环境、浙中古镇安华，在真实存在里是一个鸡鸣三县，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它四通辐辏、商贸繁华，为五行八作的麇集生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

到了剧中，它删繁就简，凸显了古镇一方水土对于一方人的养育，洗涤了草莽英雄身上常见的粗鲁、鄙俗、浮浪的痼疾，人物的剽悍、刚直、坚忍、笃信、机智、怜悯等性格，在这奇山异水中愈发茁壮。其中，主人公的驱鸡绝活、同行间的斗智过招、民间草药的神奇功效和江湖鲜为人知的神秘规矩等等都有展示，给人以欲罢不能的知识和情趣。它们于江南古镇风情轻拂中，飘逸出与剧情、人物、性情水乳交融般的情致。

就声气而言，《侠盗》应是烽火连天中的一部在谷满谷的多声交响。诚然，广播艺术作品的声音是它最大也是唯一的书写和雕刻工具。《侠盗》之所以选择广播小说剧这一样式，是基于小说叙事的细腻周密及广播剧隽永灵动的各自特点，两者迭加交融，助推作品的审美欣赏张力。可以说，《侠盗》具有充满多声部交响的潜质。

有人说，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讲故事。以万般虚拟故事的无常和有序，来补充人生的无常和有序，乃是这一文本的天职。另外，小说的写景、状物、揭示内心活动等方面，都和一般广播剧不同。特别是通过播讲抑扬顿挫、绘声绘色的再创作，应成为贯彻全剧的亮丽声部

和乐句。

综观《侠盗》全剧，作品的音响、声效及音乐，丰富斑斓。大到市井的嘈杂、战争的惨烈、群情的激昂，小到鸟虫的低鸣、斗鸡的嘶喊、众声的纷扰等等，不一而足，还原出了一个上世纪四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切“场域”。音乐（包括主题曲《一起嗨，牛淘汤》）紧扣剧情跌宕，跟紧人物命运，发挥着先声夺人的意境想象力。

当然，演员在《侠盗》中的声音演绎，不囿于小说的声音点缀，而是形象的立体再造，表现并完成角色台词鲜明的个性色彩和动作想象。个个呼之欲出，句句掷地有声，在为听众创造审美体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以真实再现市井江湖生活的《侠盗》，五行八作的人物，吞吐间呼吸着泥土的气息，迸溅着的语言生动多姿，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

就机理而言，《侠盗》应是民族气质里的一条血脉贯通的基因江河。乍看《侠盗》突出表现小人物，笔墨描绘庸常与日常，然而，它孜孜以求的是哲思与思辨的超常，即向性情和灵魂升华的审美高地攀进。

板荡之际，一群生息于中国最底层的草民蠢贼，不是望风而偃，苟且偷生，而是在战争烈焰中焕发出生命的底色。说到底，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文化血脉又被唤醒，大义在特殊的时刻火山般喷发而出。无论是周富浪、孙五歪，还是栖身敌营的佟二头，以及村姑菊红们，身上无不烙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印迹和气节胎记，熠熠闪光。

基因精神不是无源之水，也不是沙漠上突现的无定河，它从远古流向现在，从未中断干涸。剧中提及的春秋“三千越甲可吞吴”奇迹在元末重演，以及风物风味牛淘汤、高粱烧的始终贯穿，无不暗示听众这种豪气精神的一以贯之，以及文化丰沛给养，使得特定土地上的人物精神有了更为坚实的依凭。

在诸多审美层次中，天地境界与天地情怀无疑置于顶端。这是一种从“天人相分”到“天人相和”“万物皆通”的文化价值观和文艺审美。《侠盗》剧中所表现出主人公作为偷鸡贼与鸡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习俗敬畏，公鸡“黑旋

风”、母鸡“白娘子”所具有的与中国人同样的嫉恶如仇、坚贞不屈品质，一脉相承，某种意义上就是作品对天地境界的自觉追求。

“礼失求于野。”对此，《侠盗》一场尾声戏，荡开一笔，颇值玩味。庙堂之上统帅因对江湖之远周富浪身份的“钦定”，一个偷鸡贼被贴上烫金的标签走进了官修的“英烈志”，彻底

死去。然而在民间，他却被视为“鼓上蚤”时迁转世，一场草莽英雄的壮举在村夫野老、乡间书场流传，依然鲜活张扬。

有了文化基因的贯通与照应，所到之处一定会有脉脉温情，人物与作品才有可能接地气、得元气、逸生气。

（作者单位：诸暨市广播电视台）

